

Hitlers

希特勒

的追随者

古一多·克洛卜 / 著

by Guido Knopp

Helfer

希特勒的追随者

主笔：古一多·克洛卜

翻译：周 键 彭志华

海南出版社

Hitlers Helfer by Guido Knopp

© 1996 by © Bextelsmann Verlag GmbH, München

中文简体字版权 © 1999 海南出版社

由 Bextelsmann Verlag GmbH 授权出版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30-1999-3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特勒的追随者/(德)克洛卜(Knopp, G.)等著;

周 键 彭志华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9. 6

ISBN 7-80645-442-X

I. 希… II. ①克… ②周… ③彭… III. 法西斯主义-
人物-生平事迹-德国-1933~1946 IV. K 835.1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1999)第 22273 号

希特勒的追随者

古一多·克洛卜 著

周 键 彭志华 译

责任编辑:苏斌 朱晓

特邀编辑:钟庆安

★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厂印刷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75

字数:278 千字 印数:5000 册

ISBN 7-80645-442-X/K·18

定价:19.80 元

作者: 古一多·克洛卜
彼得·阿德勒
克里斯蒂安·戴克
彼得·哈特尔
鲁道尔夫·古尔特勒
吉尔克·米尔勒
整理: 贝蒂娜·德莱尔
克劳斯·松德曼

目 录

前 言		1
煽 动 者	戈培尔	21
第二号人物	戈 林	67
执行人	希姆莱	137
代理人	赫 斯	195
建筑师	斯佩尔	259
继承人	邓尼茨	301
参考文献		359

前言

——是普普通通的德国人吗？

没有希特勒，第三帝国便是不可思议的。没有他，所有的邪恶与冲动就会像鬼魅一样崩溃。第三帝国令人诅咒的存在完全取决于他，没有他，便没有第三帝国的一切。

但是光有这位独裁者还不是第三帝国，他还需要那些完全听命于他的帮手们。他的那些追随者们是他权力的载体，确切地说是保证。他们是希特勒意志的执行者。他们执行元首的命令，有时还有所发挥。

戈培尔、戈林、赫斯、希姆莱、斯佩尔、邓尼茨——这6位平步青云的人，在希特勒的独裁统治中所起的作用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是重要的。他们是很特别的罪犯吗？他们都具有其领袖所赋予的犯罪力量吗？或者只是普普通通的德国人，只是由于其特别的条件和偶然的事件才犯下累累罪行的？

约瑟夫·戈培尔正是希特勒狂热的犯罪同伙，只有他将希特勒拜为偶像。正是由于他对其偶像的忠诚，他成了“第三帝国”的纵火犯、市侩小人的教唆者，并焚烧书籍、犹太教堂及至最后发展到杀人。他用言语杀人。如果把希特勒的力量理解为威逼利诱，那么戈培尔就是“利诱”的代表。对他的同事来说，他显得既令人讨厌又魅力十足。他利用强有力的雄辩、尖酸的挖苦讽刺以及他的天赋，远比纳粹时代一般的人更能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获得别人的信任，更能使人产生憎恨和献身精神。

他好走极端。软弱和坚强，自怜和过分的自律，战斗的激情

和绝望的冷漠,自卑感和过分自信,渴望解脱和决心毁灭等,在他身上交织闪现。父母的虔诚是他不可动摇的信仰的土壤;低微的出身是他勃勃野心的动力;丑陋的跛足是他无情地憎恨人类的理由。他从未成功地消除掉别人怀疑地注视他时带给他的自卑感——即使在纳粹运动中。即使他同希特勒之间的关系也表现为感情上的一厢情愿。戈培尔这个学徒无条件地忠于其师傅希特勒,以至于他在自己使命方面,把整个存在完全系在了希特勒身上。而希特勒也欣赏他的忠诚、敏锐的思考力以及精妙的措词,但在个人关系上总要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就像每次作出重大决定那样。

这位追随者越是依赖他所崇拜的偶像的恩宠(就像酒瓶之于酗酒者),就越是热忱地塑造着这位公众偶像。他把希特勒推崇为拯救人类的耶稣。由他创造的“元首”神话(其中最狂热的信徒除了戈培尔就是希姆莱)在“元首永远是正确的”这一句话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位第三帝国的宣传部长随时都想控制所有人的感情、愿望和思想。但凡符合统一和单一节拍的东西,都是他对发过誓的人民共同体的宣传材料。

他在围绕人民情绪的舌战中常用的武器是:简朴的通告和简单易记的措词。他清楚地知道,最有效的欺骗民众意识的不是显而易见的谎言,而是半隐半现的真相。

但当真正的结局迫近时,就只有修饰的谎言能够在路线方针上稳住人民。当“抵抗到底”的口号不再管用时,他就代之以漂亮的“奇迹武器”,唆使年轻的兵士白白去送死,并把他自己的孩子也送入了坟墓:“足够彻底的预言最彻底!”

在所有憎恨犹太人的希特勒亲信当中,戈培尔是最偏激的。他的反犹太主义不是荒谬的种族理论的延伸,而是憎恨自己的结果。不容置疑,戈培尔是尽职的煽动者,连希姆莱都称他为“最

后解决”(译者注:1942~1945年希特勒法西斯分子灭绝犹太人的代用词)的第一倡议人。

约瑟夫·戈培尔是狂想的喉舌。由于这位煽动者自己早就认识到这一政治性犯罪并把它当作“较大的必要性”来保卫,所以他是一位很特殊的重罪犯。

一半是战争的驱动者,一半是伪君子——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希特勒的帮手像赫尔曼·戈林那样在政治中扮演着平易近人的双面角色;接近人民的勇士和不顾廉耻的政客。作为希特勒最早的同伙之一,戈林把这一点当作接近上流社会的资本并帮助希特勒登上无限权力的高峰。这位曾被授予高级勋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在希特勒飞黄腾达的路上助过一臂之力,直到战争结束之前,他一直被视为“元首的继承人”。虽然他早已因为其空军的无能而名声扫地,但对希特勒来说,免掉这位“腐化的瘾君子”无异于将他政权的老底交代得一干二净。因此,赫尔曼·戈林的崛起和衰落正反映了第三帝国的政治关系。对他来说动力源不是像戈培尔那样来自献身的追随精神,而是对权势的永不满足的贪欲。他顽强地为职位、头衔和财富斗争着,而这些令他无比幸福。他蛮横自大,贪得无厌并虚荣自负,但比希特勒别的任何随从都得人欢心。他的举止不像戈培尔那样玩世不恭,也不像希特勒那样高高在上,因此人们喜欢这位平易近人的开国元帅。他看起来不太有其他一些纳粹政权执行人固有的病态的人格特征。

“赫尔曼今后要么成为一个伟人,要么成为一名罪犯。”母亲曾对她的儿子很早就形成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作出这样的预言。戈林加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并不是出于一时冲动。“我加入政党,因为我是一名革命者,而不是无用思想的产物。”他的政党叫希特勒。

他不像希姆莱是个乡村小学的教员,不像罗姆是个雇佣兵,

也不像戈培尔是一个绝望之人。他能使人注意到“运动”的暴徒们所缺乏的东西：出身于良好的家庭，优雅的举止以及讨人产生好感的技巧。但首先是他在决定性的时刻表现得很“冷酷”。在追求豪华和爱慕虚荣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一个似乎天生就是政治犯的残酷无情。和 1934 年策划的罗姆事件之后的谋杀一样，对普鲁士的政敌实行恐怖统治以及建立首批集中营都是他的杰作。同时，他还要对用暴力拖走外国人并强迫他们劳动和杀害犹太人等事负责。他曾明确无误地公开承认没有良知。他说：“我没有良知，我的良知叫阿道夫·希特勒。”

尽管如此，这位第二号人物并非一个孤注一掷的人。他害怕希特勒帝国扩大战争所冒的风险，而是寄希望于在欧洲的协商会议桌边继续进行敲诈和强夺——按照解决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的方式。戈林说：“我们不要孤注一掷。”希特勒回答道：“我一生中总是孤注一掷。”使这位第二号人物萌生背叛念头的不是对和平的热爱，而是理所当然地害怕侵略扩张最终也会使他从中获益匪浅的“第三帝国”倾覆。“真是太可怕了。希特勒疯了。”但是戈林陷在了忠诚的圈套里。公开的反叛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于是他在原罪之后做出不正常的举动，成了希特勒所有追随者最热心和最具进攻性的一个，证明了自己是一个瑞典医生们早在 20 年代中期就作出诊断的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傀儡。

但是当他的杰作空军失去作用时，他也跟着完蛋了。这个满身香水味的勒罗（译者注：古罗马皇帝），滥用权力和贪污腐化的典范，沉湎在他的毒瘾和癖好之中。如果他有勇气在 1938 年制止希特勒；如果 1938 年军官政变在慕尼黑会议之前取得成功；如果戈林随后取代希特勒接管政府并如后来向罗斯福许诺的那样“停止迫害犹太人”，也许之后就既不会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会出现对犹太人实行大屠杀的时期。也许戈林的纳粹国家会按照佛朗哥的西班牙或者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的方式发展

下去。但是戈林也许因此就不是戈林了。

于是他最终认为他是作为他早已不再是的“纳粹第一号人物”去死的——沉湎在后世会公正地对待他的幻想之中：“你们将来会将我们的尸骨放进大理石棺材里。”尸体被焚烧了，却没有大理石棺材。

鲁道夫·赫斯是“希特勒的第一追随者”，直到1987年死时他仍是“希特勒的第一追随者”。

他直到生命结束也不可理解地相信纳粹政权“好的方面”。他和戈培尔一样热衷于对“元首”的过分崇拜；但是他在希特勒的帮手们中间的实际意义一直很小。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臣仆的典型。鲁道夫·赫斯愿意被别人引导。

受占支配地位的严父的教育，他一直没有摆脱青年时代的拘谨和羞怯。纪律和履行义务，忠诚和服从是弗兰茨·赫斯教导他儿子在人生道路上应遵循的原则——这是那个时代的典范，希特勒从中获得了好处。这位“代理人”在他一生中具有两副面孔的特征：激烈反对贪污受贿和滥用职权的党的道德倡导者，而转眼又以要求在占领的波兰实施体罚的毒辣的煽动者的面目出现了。这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勇敢而喜欢作决定的军官在希特勒的面前（希特勒语：“我的赫塞尔”）逐渐变得卑躬屈膝地顺从。这位在政治上失去影响的“代理人”由于不通世故而被希特勒别的追随者用微笑加以讥讽。他在1941年令人吃惊地获得了决断力和冒险精神，在战争进行之中飞到敌人那边去了。

赫斯从来也不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译者注：即纳粹党）的首脑——但是他一开始就给人一种狂热、诚实、可信的假相。“元首”的头衔是赫斯的杰作。他自己经常被人误解的头衔“元首的代理人”只适用于纳粹党内，而没有实际的职权，希特勒不需要一个有主见的管理者，他需要的是一个使他摆脱烦琐的党务工作的秘书。这样赫斯便成了这位独裁者的首席仆从。

他不只是用冷冰冰的官僚德语来掩盖政权的恐怖统治，而且他还完全信服地参与了这种恐怖统治，1935年的纽伦堡种族法产生于赫斯的办公室。不许犹太人从事律师和医生职业的禁令上有他的签名。根据赫斯的自白，在他认识希特勒之前，他就已经是一个狂热的相信“犹太人搞世界阴谋”的反犹太主义者。

至于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英国之行，大量的逸闻秘史几乎将发生的事情像雾一样笼罩起来了。确信的一点是：希特勒对他“代理人”这一荒唐的冒险并不知情。但是赫斯却知道希特勒为侵袭苏联而做的准备工作。为了避免两条战线作战的危险，这位有翅膀的帕尔塞法尔（译者注：德国传说中的人物）在完全错误判断英国方面态度的情况下寻求和英国相互理解。他梦想用和英国取得的和平向希特勒正式表明自己的忠诚。赫斯十分确信事后能获得希特勒的赞同。

然而与此相反，希特勒却宣称他疯了，于是赫斯陷入了一种绝望的垂死挣扎，直至他死去。1987年，这位“世界上最昂贵的犯人”在施潘道监狱自杀。这位老人自1941年在英国人的监禁中5次打算自杀以来，终于用一根电线上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确实确实是自杀，本书可以为证。

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座右铭是：“存在胜于似乎。”也许没有人怀疑过，为什么偏偏是这么个平淡无奇的人成了希特勒最有权势的宠臣。他高效率地，毫不手软地“为希特勒清除垃圾”（希维林·冯·克洛塞克语）。他铁石心肠地下令杀戮并且机械地、系统地、彻底地按希特勒的意图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其罪行是如此地难以形容。而这个罪犯又是如此的平庸。他的本性中没有什么出色和伟大的东西。海因里希·希姆莱同时代的人已经将他描述为“完全无足轻重的人”（阿尔伯特·斯佩尔语），“没有特别爱好的人”（瓦尔特·多恩伯格将军语），“有着强烈的节约意识的乡村小学教师”（党卫队头目奥斯瓦尔德

·保尔语)。

在别的时代他也许可以作为教师发挥他的才能。如果他成为了教师，他会教育学生要具备普通人的美德：遵纪和服从，能干和节约。他有可能成为政府官员并肯定证明是德国财政官僚机构中一个很出色的成员：非常认真，不接受贿赂，遵纪守法。

希姆莱完成他的任务就像一个财政官员在成百上千份纳税申报上用缩写签字一样：将民族大屠杀作为组织上的问题。最后他根本不担心牺牲品的不幸，但却非常担心施暴者精神上的痛苦。没有哪一位纳粹分子的生平像他的那样严重地损及德国的人文主义教育。

这位被卷入程度最深的人既不来自流氓无产者圈子，也不来自勃劳瑙(译者注：希特勒的出生地)。希姆莱出身于体面的环境：那里的人们信仰天主教，忠于国王，有德行，受过教育，土生土长并具有巴伐利亚的特征。他的父亲是兰茨胡特人文主义的9年制文科中学的副校长。路德维希·托马曾在这儿就读，诗人汉斯·卡罗萨以及后来的联邦总统罗曼·赫尔佐克都在这儿死记硬背过拉丁文。如果不是所受的教育，那么是什么使海因里希·希姆莱掉进罪恶的深渊之中呢？

他理想中的人是冷漠无情和视死如归的人，他的目标是培育这种类型的人。他劝诫他手下的人要有正直而诚实的美德，但同时又会使用暴力和进行集体大屠杀。

他不是一个脑力劳动者，他原本很笨拙，胆怯，判断能力也差。他获得权威不是出于他本人信念上的力量，而是借助于有目的的权力的推动作用。希姆莱要的不是职务，而是统治。他不是要获得对国家的控制权，他那有权力的机构应该成为国家本身。

清醒和冷静只是他相互矛盾的性格的一个方面。同时他又被一种由种族理论、自然疗法和民族神秘学混和而成的劣质蜂蜜酒搞得晕头转向。他庄重地举行名声不好的庆祝活动，组织迷

信的仪式,并为他神秘的严格规定的仪式建立神圣的场所。所有这一切都受到希特勒的追随者们的嘲笑。

这些都被忘却了。而人们不能忘记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是他对成百万人的大屠杀应负的责任。当然,他也是“奉命行事”而且一直喜欢强调这一点(“元首希望……”),但是希特勒不可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执行者(除希姆莱之外,希特勒也根本没考虑再找更合适的人)。希姆莱内心不存丝毫同情地组织了暴力的“最后解决”。即使在疯狂行动的现场,这位作案人也没有对牺牲者产生一点感情冲动。希姆莱认为党卫队的传奇是:对自己严厉的人可以对别人冷酷无情。

恰恰是这位甘愿效劳的执行人,“忠实的海因里希”,在战争进行到最后的几个月里实施了一种两面派的绝望政策。他一方面想组织一场民族风暴,将人变成狼,而另一方面又在秘密会谈中向西方提出投降的建议——却没有意识到他的名字早已作为大屠杀不折不扣的同义词了。这样他最终就像 11 年前毫无顾忌地背叛他最初的两位支持者恩斯特·罗姆和格雷哥尔·斯特拉塞尔一样背叛了他的“元首”。

“你的荣誉叫做忠诚。”这个由希姆莱宣传鼓动党卫队的口号,最终所具有的价值由他亲身证明了。

阿尔伯特·斯佩尔一生都否认知晓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位希特勒最喜欢的建筑师和军备部长尽管在纽伦堡法庭上承认作为惟一的一个对纳粹政权所犯罪行负有“领导层的全部责任”的人,但个人却宣称自己是“无罪的”。在奴役苦力并使他们中间数千人死亡以及将大量的犹太人从他们的住所赶出去方面,他都同样负有责任,但他却自称直到最后都没有觉察出消灭犹太人一事——真是一个弥天大谎。

斯佩尔出身于良好的家庭,作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员,在后期被委以重任,而不必自己通过努力取得向上爬的途

径。这位感觉灵敏的建筑师想为希特勒创造几千年之后还可以证明其统治的建筑物。

斯佩尔赋予了褐色(译者注：纳粹党的代表色)的意识形态以石质的形式。而希特勒这位没有如愿以偿地成为建筑大师的良师益友受到了他“养子”斯佩尔工作的鼓舞。几十年之后，斯佩尔写道：如果希特勒有过朋友的话，那么这个朋友就是他。能容纳 40 万人的体育场、新的国务总理办公厅、世界首都“日耳曼尼亚”的中心都是涂上了水泥的突出个人狂欲的场所，只有巴比伦的建筑才能与之相匹敌。

斯佩尔和希特勒宛如一对情侣，联结他们的是对建筑的爱好。其中斯佩尔当然是对希特勒言听计从的女方。他的设计草案上都写着“按照元首的想法”。

他最真挚的感情没有奉献给自己的家庭——他的深情属于希特勒。斯佩尔几十年后回忆说：“对于一座伟大的建筑，我就像浮士德一样出卖了我的灵魂。现在，我找到了我的靡菲斯特。”

这位受宠爱的建筑师之所以被任命为“帝国武器和弹药部长”要归功于这种异乎寻常的关系。精力充沛的斯佩尔许诺创造一个军备奇迹。他实现这一目标的代价是强迫数十万工人和集中营犯人劳动。他为了提高实际战斗兵力和生产所作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如果没有使战争延长整整一年，也延长了好几个月。

在这方面他从来没有将自己看作是信仰犯罪者，他喜欢将自己看作是为什么样的目的服务归根结底都一样的艺术家。他虽然被敌人视为技术政治家，却迷恋于占有权力的崇高的感情之中。无限制地抓人和资源吸引着他。臆想为崇高的目标任何时候都不允许对存在于其中的道德质疑。斯佩尔做到了为了自己和他的理想而利用德行。

斯佩尔在纳粹政权垮台后还声称：“我们都极为重视德和礼

俗”。但是正如他知道杀害有精神障碍的人和“通过劳动进行消灭”的真相一样，他最迟从 1943 年 10 月起就肯定知道了对犹太人的集体大屠杀。尽管他不是积极的反犹太主义分子，但他和许多别的人一样以可怕的无动于衷不想看见令人难以置信的真相。

对牺牲品漠不关心，掉转目光表示同意：斯佩尔的态度示范性地反映了“丧失道德的德国人”的精神创伤。只有在回避和排斥令人无法忍受的真相之中才可能继续生活。漠不关心，甚而直接以否认可以解除责任并保护个人免受内心深处的矛盾的折磨。谁要是像斯佩尔一样没有参与犯罪，谁就会认为追究罪责是不允许的。尤其是因为他根据自己的作证曾进行过抵抗。

当斯佩尔在 1944 年和 1945 年之交的冬季清醒地意识到战争不久将结束时，自身对活下去的强烈渴望取得了优势：他还不满 40 岁，“千年帝国”不应该意味着一切。于是他想方设法地阻挠希特勒丧失理智下达的“炸毁地球”的命令，“为了不使居民的情形继续恶化”。而事实上他也需要完好无损的工业设备和企业作为在西方胜利者们面前展现他良好意愿的有力的手段。他私下里将自己看作战后德国类似“重建部长”的人物了。

斯佩尔因此公开采取反对希特勒的态度。尽管如此，他再一次回到国务总理办公厅，在掩体里最后一次拜见他的支持者——并不是为了在富有浪漫色彩的感情冲动下和他的促进者告别，促使他这样做的更多成分是害怕被任命为继承人或者至少会在希特勒之后的政府部长名单中出现以及由此会在和盟军进行的解救性的合作中丧失信誉。

这次冒险飞往被围困的柏林是值得的：在一次私下会谈之后，希特勒在遗嘱中指定邓尼茨为接班人，而在其中对斯佩尔只字不提。尽管斯佩尔不能逃脱在施潘道 20 年的监禁生活。然而

鉴于那些在纽伦堡法庭上不为人所知而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事实，对于斯佩尔来说，这种结局可能要算便宜他了。

为什么在我们的追随者六重奏乐组里作为军人的偏偏是卡尔·邓尼茨？他是德国政治士兵的象征，直到最后还喊着坚持到底的顽固口号，并同样地要对战争后期数十万牺牲品负责。在这种情况下，邓尼茨却自认为是非政治士兵的典型，他只是尽了他的职责，别的就什么也没干了。许多人愿意相信他是这样的人：在他们看来，邓尼茨是千百万逃难者的救星。然而西方胜利者仍将他看作是“战犯”。他们后来形象地称其为“魔鬼海军上将”。这种过激的说法和冷静的因信仰犯罪的邓尼茨是极不相配的。

希特勒的这位继承人从来也不是纳粹党党员，但却一直是坚定的纳粹分子。邓尼茨在对“强有力的人”的渴求中将希特勒看作应该无条件地去追随的“救星”的完美化身。“和元首相比，我们都是可怜的无足轻重的人。”

作为潜艇舰队司令官的邓尼茨至少被他的对手们看作是“海战中的隆美尔”。邱吉尔在战后说：“惟一不断使我感到害怕的是邓尼茨的潜水艇。”但是当盟军研制出新的无线电探测定位技术以及英国人能够破译德国人的无线电通信时，早期的胜利便转变为所有兵种最可怕的回忆；3/4的潜水艇驾驶员没能生还。

失败并没有使这位海军上将不安。他在一部宣传影片中滔滔不绝地讲：“战斗就意味着牺牲”，并无情地推销这句格言。他禁止营救乘船遇难者，是无仁慈之心的军事司法的执行人，并用无意义的命令最后征来训练不充分的年轻的海军士兵，使他们去作无谓的牺牲。

罪责始于何处？牵连终于何处？如果不是一个国家的元首对国家行为负责，那么又是谁呢？邓尼茨从不以这些问题自问。直

至最后他都灵活地掩盖自己的过去。他对纳粹政权的罪行保持沉默，却一味抱怨纽伦堡审判中对他“不公正”的判决。

邓尼茨知道有关杀害犹太人的情况——但他却自称对此一无所知。他拒绝过某些抵制犯罪行为的请求，声称“我肯定不会损害我和希特勒的关系。”在他看来，保持在纳粹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更为重要。

如果有一个关于在独裁统治中不讲道德的军官的教育剧本，那么就是卡尔·邓尼茨的一生。

戈培尔、戈林、赫斯、希姆莱、斯佩尔、邓尼茨是希特勒的6个帮手及其权力的6个执行者。如果没有他们以及许多别的帮手，希特勒是不可能获得并维持其统治的。

然而直到今天才显露出希特勒独裁的真正不详之兆，20世纪真正的原罪并不是那场战争所公开表现出的恐怖，而是隐藏于其中的罪行：奥斯威辛，即有计划的大屠杀。那场对同时代人是如此可怕的战争在冷静的历史反思中越来越退到次要的位置——在50多年之后的今天它只像一件外罩，在其包裹下，对犹太人的集体大迫害曾得以隐藏和贯彻实施。

执行者当然不只是“希特勒的帮手们”，而且还有别的帮凶：大约有50万德国人对此负有直接的责任。

但是在一位美国社会学家看来，这还远远不够：丹尼尔·戈尔德哈根认为“希特勒的帮手”是所有的德国人。他充满挑衅性的论点是：甘愿效劳的“最后解决”的执行人不只是希特勒一人，也不只是他的追随者，也根本不只是一群名声不好的暴虐狂的“纳粹分子”。凶手是“普普通通的德国人”，是数十万和善友好的一家之父。

“德国人”受一种“十分有害而易于扩散的仇恨”和“认为犹太人是恶魔的幻觉”的驱使，以致于坚信“犹太人”该死。他们自称没有蓄意杀人，因为他们是被迫那样做的。但却不是出